

邵晋涵之史学

(台湾)杜维运

邵晋涵，字与桐，号二云，又号南江，浙江余姚人。生于清乾隆八年(1743)。少多病，而独善读书，数行俱下，寒暑舟车，未尝顷刻辍业。于四部七录，无不探究。乾隆三十年(1765)举于乡，乾隆三十六年(1771)成进士，由文渊阁校理进直阁事，预修《三通》、《八旗通志》及国史。乾隆三十八年(1773)开四库全书馆，诏入馆中充纂修官，特授翰林院庶吉士。当时著名学者如戴震、周永年、余集、杨昌霖等同入馆编校，誉传士林，有“五征君”之号。逾年，授职编修。乾隆五十六年(1791)，御试翰詹，名列二等，擢左春坊左中允，迁侍讲，转补侍读，历左庶子，翰林院侍讲学士，日讲起居注官，皆兼文渊阁校理。并历充咸安宫总裁，《万寿盛典》、《八旗通志》、国史馆与三通馆之纂修官。由于邵氏体弱多病，而诸馆朝入暮出，相当辛劳，以致积劳成疾，于嘉庆元年(1796)溘然长逝，享年五十四岁。此邵氏一生之概略也。①

初步观察邵氏一生，其出身在浙东，而自乾隆三十六年通籍以后二十余年中，任职皆在京师，四库全书馆尤为其学术发挥之重地。乾隆年间，朴学盛行，特别是四库全书馆设立之后，讲求史学者“非马端临氏之所为整齐类比，即王伯厚之所为考逸搜遗”。②邵氏未有不受此风气影响者。然细稽邵氏生平及其学术造诣，则邵氏与章学诚同为浙东学派之后劲，其史学与章氏相颉颃，以真挚之情，写一家之史，以敏锐之见，发挥史学思想、史学理论、史学方法之精蕴，而又一身系文献之安危，所受朴学之影响，适足以激励其学，而未能转移其学。此有待发覆之大问题也。

(一)邵氏与浙东学派的关系

钱大昕于所作邵氏墓志铭中云：“君生长浙东，习闻戴山、南雷诸先生绪论，于明季朋党，奄寺乱政，及唐鲁二王起兵本末，口讲手画，往往出于正史之外。自君谢世，而南江文献无可徵矣。”③

章学诚于所作邵氏别传中云：“南宋以来，浙东儒哲，讲性命者，多攻史学，历有师承。宋明两朝记载，皆稿荟于浙东，史馆取为衷据，其间文献之徵，所见所闻所传闻者，容有中原耆宿不克与闻者矣。邵君先世多讲学，至君从祖廷采，善古文辞，著《思复堂文集》，发明姚江之学，与胜国遗闻轶事经纬，成一家言，蔚然大家。……君之于学，无所不通。……尤长于史，自其家传乡习，闻见迥异于人。”④

王昶于所作邵氏墓表中云：“浙东自明中叶王阳明先生以道学显，而功业风义兼之；刘念台先生以忠直著，大节凜然；及其弟子黄梨洲先生覃研经术，精通理数，而尤博洽于文辞。君生于其乡，宗仰三先生，用为私淑，故性情质直贞亮，而经工纬史，涉猎百家，略能诵忆”。⑤钱大昕、章学诚、王昶与邵氏同为乾嘉时代之学人，且相交甚深。钱氏指出其习闻浙东儒哲刘宗周(戴山)、黄宗羲(南雷)诸先生之绪论，章氏指出其受浙东学风及家学之影响；王氏指出其私淑乡前辈王守仁、刘宗周、黄宗羲而得其性情与学问。然则邵氏与浙东史学派之关系，盖

可知矣。自幼浸淫于浙东学风之中，家传乡习，郁积已深，以致一旦处身朴学洪流，而卓然不失其本色。近人谓“章、邵二氏，异军特起，自致通达，非与黄、全诸氏有何因缘”，^⑥又岂为精当之论哉！

（二）邵氏与朴学的关系

清代朴学风气，大盛于乾隆三十八年开四库全书馆以后。章学诚曾愷切言之云：“方四库征书，遗籍秘册，荟萃都下，学士侈于闻见之富，别为风气，讲求史学，非马端临氏之所为整齐类比，即王伯厚氏之所为考逸搜遗，是其研索之苦，篋积之勤，为功良不可少。然理止矣。至若前人所谓决断去取，各自成家，无取方圆求备，惟冀有当于春秋经世，庶几先王之志焉者，则河汉矣。”^⑦

出生浙东，而置身四库馆之邵氏，其反应为何若耶？

邵氏亦从事于整齐类比，考逸搜遗之史学工作矣。薛居正奉诏撰修之《旧五代史》，由于欧阳修之《新五代史》出，流传渐稀。明成祖诏修《永乐大典》，《旧五代史》在辑存之列，惟是体例为“因韵求字，因字考事”，《旧五代史》遂遭割裂，其本来面目不复见。邵氏既入四库馆，乃从事《旧五代史》之辑佚工作，自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录分散各韵之《旧五代史》佚文，得其十之八九，复采《册府元龟》、《太平御览》、《资治通鉴》、《五代会要》、《契丹国志》、《北梦琐言》诸书，以补其缺。其字句脱落，章义舛讹处，则据前代征引该书之书，如《通鉴考异》、《通鉴注》、《太平广记》、《玉海》、《笔谈》、《容斋五笔》、《青湘杂记》、《职官分记》、《锦绣万花谷》、《艺文类聚》、《记纂渊海》之类，为之参互校订。至于“史家所记事迹，流传互异，彼此各有舛误”^⑧，则据《新·旧唐书》、《东都事略》、《宋史》、《辽史》、《续通鉴长编》、《五代春秋》、《九国志》、《十国春秋》及宋人说部文集与五代碑碣尚存者，详为考核，各加案语，以资辩证。欧史与薛史不合处，亦悉为辩证，详加案语，以示折衷^⑨。于是沉沦数百年之一代之史，几尽复旧观。此一工作，谓之为考逸搜遗可也，谓之为整齐类比亦无可也。而邵氏辑此书时，原注有《永乐大典》卷数，及采补书名卷数，俾读者于薛史面目仍可据以寻究，而武英殿刊本乃尽删之，又岂邵氏之意哉！

邵氏亦若朴学家之博雅矣，凡经学，古音韵学，金石学，无所不通，尤精于经学。时人谓“学者唯知先生之经，未知先生之史”^⑩，则其在经学上之造诣可知。其于经，尤覃精训诂，所著《尔雅正义》一书，“功赅而力勤，识清而裁密”^⑪，为“不朽”^⑫之作。其著此书，系有感于邢昺《尔雅疏》之浅陋，于是倾十年之力，博采旧说，荟粹群书，“取声近之字，旁推交通”，以“阐提古训，辨识古文”，此古音韵学知识之运用也，此清乾嘉朴学家治文字、声音、训诂之学者所走之途径也。并世学者洪亮吉曾以诗誉其书云：“君疏尔雅篇，订正五大儒，使我心上疑，一日顿扫除。君师钱少詹（大昕），精识也所无。吴门及钱塘，复有王（鸣盛）与卢（文弨）。皆言此书传，远胜唐义疏。”^⑬

朴学大师钱大昕、王鸣盛、卢文弨盛推其书，则邵氏亦在朴学阵营之中矣。置身朴学风气极盛之时，未有不受风气之激荡者。而邵氏复能守约^⑭，骛博而不失专家之体^⑮，专著《尔雅正义》自谓“此书苦心，不难博证，而难于别择之中，能割所爱耳。而外人竟有病其略者，斯事所以难言”^⑯。博洽而能约取，正浙东之学贵专家之教也。

(三)以真挚之情，写一家之史

自晚明以来，浙东驰名学者，皆有真挚之情。邵氏生值盛世，而其真挚之情，仍随处可见。他嘉许“辨章同异，持论衷于和平”^{①⑦}之文，称美“和平敦厚大雅之音”^{①⑧}。尝谓“诗之原出于天籁。天怀有独挚，其诗皆有可传。作性情揉杂以尘垢者，纵终身学之无益”^{①⑨}。其重述友人之论则云：“文章体格，视其年其遇而变，其不可变者性情也。舍性情而求诸体格，是为无实之华。学识日充，则性情日以和粹。故善养性情者，又视乎学焉”^{②⑩}。其论诗文重性情而归于温柔敦厚之教者又如此。其写一家之史，亦自真挚之情出发。其锐意写有宋一代之史也，尽出于情之不能已。章学诚曾语邵氏云：“史学不求家法，则贪奇嗜琐，但知日务增华，不过千年，将恐天地不足容架阁矣。君抚膺叹绝，欲以斯意刊定前史，自成一家。时议咸谓前史榛芜，莫甚于元人三史，而措功则宋史尤难，君遂慨然自任。”^{②⑪}“抚膺叹绝”，“慨然自任”，皆见其情。其撰写宋史之情形，据其弟子章贻选云：“先师尝谓宋史自南渡以后，尤为荒谬。以东都赖有王氏《事略》故也。故先辑《南都事略》，欲使前后条贯粗具，然后别出心裁，更为赵宋一代全书，其标题不称宋史，而称《宋志》，亦见先师有微意焉。然《南都》尚未卒业，而《宋志》亦有草创，皆参差未定稿也。诸家状志，但称《南都事略》，当属传闻未审。贻选尝亲承其说于先师，其实如此。”^{②⑫}章学诚也说：“识者知君笔削成书，必有随刊疏凿之功。蔚为艺林钜观。诂知竟坐才高嗜博，官程私课，分功固多，晚年日月益促，又体羸善病，人事蹉跎其间，遂致美志不就，淹忽下世。”^{②⑬}

据此可知邵氏曾参用大量资料，撰写《南都事略》一书，以上续王偁之《东都事略》，并别出心裁，写有宋一代之全史，名之曰《宋志》。惟邵氏“才高嗜博”，“体羸善病”，“官程私课”分其功，复“京师困于应酬”，致二书均未完成。迄至今日，其书已湮没于天地之间。此不惟邵氏之不幸，亦史学界之不幸也！

邵氏尝述其写宋史之宗旨云：“宋人门户之习，语录庸陋之风，诚可鄙也。然其立身制行，出于伦常日月，何可废耶？士大夫博学工文，雄出当世，而于辞受取与，出处进退之间，不能无箠豆万钟之择，本心既失，其他又何议焉”。^{②⑭}此又显见其对时风之感愧，而仰慕宋人之真情毕现。倾力以写宋史，又岂待外铄耶！

(四)以敏锐之见，发挥史学思想之精蕴

长于发挥史学思想、史学理论、史学方法之章学诚对邵氏极致敬佩之意。彼曾云：“与余论史。契合隐微。余著《文史通义》，不无别识独裁。不知者或相讥议。君每见余书，辄谓如探其胸中之所欲言；间有乍闻错愕，俄转为惊喜者，亦不一而足。以余所知解，视君之学，不啻如稊米之在太仓，而君乃深契如是。古人所称歎之嗜，殆有天性，不可解耶？”^{②⑮}迨邵氏下世，章氏慨然曰：“嗟乎！昊天生百才士，不能得一史才，生十史才，不能得一史识。有才有识如此，而又不佑其成，若有物忌者然，岂不重可惜哉！”^{②⑯}

以自视甚高，性情孤傲之章氏，而服膺邵氏如此，称其《文史通义》中所论，若探邵氏胸中所欲言，此必有其真实性，而非夸大之言。《文史通义·书教》后附邵氏之评论语云：“纪传史裁，参仿袁枢，是貌同心异。以之上接《尚书》家言，是貌异心同。是篇所推，于六艺为支子，

于史学为大宗，于前史为中流砥柱，于后学为蚕丛开山。”《原道》后邵氏亦评之云：“是篇初出，传稿京师，同人素爱章氏文者，皆不满意，谓蹈宋人语录习气，不免陈腐取憎，与其平日为文不类，至有移书相规诫者。余谛审之，谓朱少白（名锡庚）曰：‘此乃明其《通义》所著一切，创言别论，皆出自然，无矫强耳。语虽浑成，意多精湛，未可议也’。”此为邵氏激赏《文史通义》之斑斑可考者。邵氏在四库馆中所撰史部书之提要，则其有史识之明证也。如《史记提要》云：“其叙事多本《左氏春秋》，所谓古文也。秦汉以来故事，次第增叙焉。其义则取诸《公羊春秋》，辨文家质家之同异，论定人物，多寓文与而实不与之意，皆公羊氏之法也。迂尝问《春秋》于董仲舒，仲舒故善公羊之学者，迂能申明其义例，虽未必尽得圣经之传，要可见汉人经学，各有归承矣。其文章体例，则参诸《吕氏春秋》，而稍微为变通。《吕氏春秋》为十二纪、八览、六论，此书为十二本纪、十表、八书、三十世家、七十列传，篇帙之离合，先后不必尽同，要其立纲分目，节次相成，首尾通贯，指归则一而已。世尝讥史迂义法背经训，而称其文章为创古独制，岂得为通论哉！”^{②7}邵氏论一代之史，而窥其思想之渊源，寻其叙事之所本，详其文章体例之所参稽，此论之极有深度者也。他如于《后汉书提要》，揭槩“史以纪实”；于《周书提要》强调“文质因时，经载从实”；于《新·旧唐书提要》主张修史之际，当“讨论其是非，决择其轻重，载事务实，而不轻褒贬，立言扶质，而不尚扞掇”，等等，均涉及史学思想、理论及方法的大问题，反映出邵氏史学思想的精华。至于自史书之取材，自史学家之学术思想渊源，以定一代史书之优劣，又其评论史书所独具之法眼也。

邵氏在四库馆中所作之史部书提要，正史中除《三国志》、《旧五代史》以外，皆出其手。此外又作《史记汇解》、《史记正义》、《两朝纲目备要》、《通鉴前编》、《通鉴纲目前编》诸书之提要。惟与现行之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相比较，内容文句，颇多殊异。大凡邵氏博辨处皆保留，而以议论发挥处，则多遭删削。于此亦可窥乾嘉学风之消息焉。

以敏锐之见，发挥史学思想，史学理论、史学方法之精蕴，邵氏与章学诚盖深交契合焉。二人识见相若，而邵氏以博辨胜^{②8}，章氏以理趣胜，而惜乎邵氏未能以类似《文史通义》之书传世也！

结语

章学诚既盛赞邵氏之有史才、史识矣，钱大昕则云：“自四库馆开，而士大夫始重经史之学。言经学则推戴吉士震，言史学则推君。君于国史，当在儒林、文苑之列，朝野无间言。”^{②9}阮元亦云：“余姚翰林学士邵二云先生，以醇和廉介之性，为沉博邃精之学，经学史学，并冠一时，久为海内共推。”^{③0}及其卒，王昶叙述其在当时所引起之震撼云：“学士邵君之卒也，卿大夫相与悼于朝，汲古通经，博闻宏览之儒相与恸于野，而大臣之领国史者，迄今犹咨嗟太息，重惜其亡。”^{③1}

邵氏之经学、史学为时人推重如此。一旦长逝，时人之哀痛，出于至诚^{③2}。其何以至此哉？

侧身四库馆，回翔清署，二十余年，天下宗仰，其致高名固宜。其学淹博，与朴学家相契合，而亦重专门著述，不悖浙东史学之教。学林盛称之，又岂偶然？“以醇和廉介之性，为沉博邃精之学”，宜乎朝野之重惜其亡也！然邵氏所遗留之著述有限，与其声名甚不相符。体羸善病，中寿而逝，又才高嗜博，官程私课分其功，京师应酬劳其形，其学术成绩，又宁能丰硕？章学诚能“撰著于车尘马足之间”^{③3}，以其郁郁不得志也。邵氏得意当时，又岂能“伏篋于经摺

①邵晋涵之生平，主要参考钱大昕《潜研堂文集》卷四十三《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学士邵君墓志铭》、章学诚《章氏遗书》卷十八《邵与桐别传》，江藩《汉学师承记》卷六《邵晋涵传》，洪亮吉《卷施阁文甲集》卷九《邵学家传》以及《国朝耆献类徵初编》卷一三〇《词臣》十六、黄云眉《清邵二云先生晋涵年谱》。

②④⑦⑮⑰⑲⑳㉑㉒《邵与桐别传》。

③⑳《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学士邵君墓志铭》。

⑤⑪《国朝耆献类徵初编》卷一三〇《词臣》十六。

⑥金毓麒《中国史学史》第九章《近代史家述略》。

⑧《旧五代史》编定凡例》。

⑨以上所言《旧五代史》之辑佚工作，参见《旧五代史》编定凡例》，载于清乾隆武英殿刊本《旧五代史》前。

⑩阮元《南江邵氏遗书序》，载于《南江札记》前。

⑪⑫⑬⑭《章氏遗书》卷九《与邵二云论学》。

⑮洪亮吉《卷施阁诗集》卷八《有人都者五篇寄发》。

⑯章廷枫于章学诚所作《邵与桐别传》后云：“叔父（指章学诚）尝自谓生平蕴蓄，惟先师（指邵晋涵）知之最深，亦自谓能知先师之深与世殊异者三，先师以博洽见称，而不知其难在能守约，以经训行世，不知其长乃在史裁，以汉诂推尊，不知宗主乃在宋学。”

⑰《邵与桐别传》章贻选注语中引。

⑱《南江文钞》卷四《周耕厓意林注序》。

⑲同书同卷《国朝姚江诗存序》。

⑲同书同卷《震尊彝遗诗序》。

⑲同书同卷《槐堂遗集序》。

㉑《邵与桐别传》章贻选按语。

㉒邵晋涵告章学诚之语，见《邵与桐别传》。

㉓邵晋涵《南江文钞》（四卷本）卷三。

㉔邵晋涵博学，凡发议论，皆博征实据，不涉虚诞。钱大昕称其著述“皆实事求是”（见《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学士邵君墓志铭》）。

㉕阮元《南江邵氏遗书序》。

㉖维运写《赵翼传》，流览乾嘉时代文集诗集近两百种，凡遇写及邵晋涵者，无不敬佩其人及其学。惜当时未将此类资料辑存耳。

㉗近人基于表彰之义，写及邵晋涵之生平与学术者，约有：

黄云眉《清邵二云先生晋涵年谱》（商务，民国二十一年初版）。

训薰《清代浙东之史学》（《史学杂志》第二卷第六期，民国十九年十二月）。

仓修良《邵晋涵史学概述》（《史学史研究》，一九八二年第三期）。

南炳文《邵晋涵》（载于《中国史学家评传》下册，中州古籍出版社，一九八五年初版）。

张舜徽《清儒学记》《浙东学记》第六。